

# 清代配享太庙旨在维护皇权政治

◎王美珏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由统治者主导的祭祀行为隶属于“五礼”之冠——吉礼，重在抒发对天神、地祇及人鬼的恭敬之情。其中，崇祀先祖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庙，便是历代统治者供奉皇家先祖神位的宗庙（夏称“世室”，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以后称“太庙”）。所谓“配享”，即帝王选取少数王公、大臣，将其神位供奉于太庙主位神牌两侧，或是东西偏殿，使其成为人臣竞相追逐的身后荣光。

## 旗人和宗室占据绝对优势

纵观整个清代，功臣名将可谓层见迭出。但是，仅有 26 名功勋卓著的王公、大臣得以配享太庙，具体情况如下。

前殿东庑配享功王 13 名：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清太祖亲弟）、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袞、宣献郡王界堪（三人均属清太祖伯父，皆附福晋）、礼烈亲王代善（清太祖次子）、睿忠亲王多尔袞（清太祖十四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清太祖亲侄）、豫通亲王多铎（清太祖十五子）、肃康亲王豪格（清太宗长子）、克勤郡王岳托（清太宗亲侄）、怡贤亲王允祥（清圣祖十三子）、超勇襄亲王策凌（蒙古亲王，固伦额驸）、恭忠亲王奕訢（清宣宗六子）。

前殿西庑配享功臣 13 名：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果毅公图尔格、雄勇公图赖、忠达公大学士张英次子。雍正八年（1730），因其在纂修圣祖实录、缮写上谕等方面有功，清帝特许其日后配享太庙。但进入乾隆朝后，张廷玉声势日盛，且与鄂尔泰成满汉竞争之势，君臣渐生嫌隙。乾隆十三年始，张廷玉屡以“七十悬车”乞休，均遭婉拒。次年底，其又恳求，并请皇帝重新配享事宜，终获许可。只是，对此逾格恩赏，张廷玉既不亲赴阙庭谢恩，又与门生汪由敦潜通消息。此举彻底激怒乾隆帝，他不仅迫使张廷玉请罢配享，又在朝臣一片停罢、羞辱声中，正式下令取消其配享。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仍获准“优食太庙”。纵观乾隆帝对其配享的反复予夺，以及张廷玉竟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大臣，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对满汉竞争的厌恶与忌惮，以及对汉人官员始终未曾消散的防范与压制。

从选取标准来看，首先，开国元勋、早期宗亲的身份标签，是清帝衡量配享太庙与否的首要因素。例如，费英东、额亦都、扬古利等追随太祖、太宗参赞庙谟，开疆拓土，费英东更被顺治帝赞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清世祖实录》）；礼敦、多尔袞、岳托等皆为清早期宗亲，对于王朝初定贡献较大。其次，允祥、博恒、僧格林沁、奕訢等人，或公忠体国，勤于政务，或忠勇朴诚、编纂官府，显现出“经国责襄”与“安邦定国”成为清中后期帝王选取配享人员之关键。再者，就旗人、宗室在清代功臣配享太庙中的绝对优势——旗人有 23 人，其中宗室又有 12 人，再加上多数组员均在武功方面“懋建殊勋”，可见宗室、旗人及武将在清代政治荣誉面前的优势。

## 皇权得到极大彰显

谈及清代功臣配享，就不得不提与此相关的三大政治风波，即“多尔袞二人太庙”“张廷玉的艰难配享”以及“和琳被撤出太庙”。发生在三人身

上的特殊遭遇，表明功臣配享与清代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袞死于喀喇城。顺治帝不仅亲率王大臣缟服迎奠，还诏尊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尊其妃为义皇后，于次年正月一同升祔太庙。但甫过两个月，顺治帝便作出亲政后的有力回击——定其谋逆之罪，诏令削爵、撤庙、黜宗室等。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帝念其功勋，认为谋逆乃因“宵小奸谋，构成冤狱”，下令为之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清史稿·多尔袞传》）。可以说，多尔袞从升祔到配享太庙，不仅是后世帝王对其从君到臣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功过是非的又一次“盖棺论定”，更是借此笼络宗亲，从而冲抵早严惩多尔袞及其党羽所留下的负面影响。

至于张廷玉在配享问题上面对乾隆皇帝的持续重压，在整个清代都是绝无仅有的。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雍正八年（1730），因其在纂修圣祖实录、缮写上谕等方面有功，清帝特许其日后配享太庙。但进入乾隆朝后，张廷玉声势日盛，且与鄂尔泰成满汉竞争之势，君臣渐生嫌隙。乾隆十三年始，张廷玉屡以“七十悬车”乞休，均遭婉拒。次年底，其又恳求，并请皇帝重新配享事宜，终获许可。只是，对此逾格恩赏，张廷玉既不亲赴阙庭谢恩，又与门生汪由敦潜通消息。此举彻底激怒乾隆帝，他不仅迫使张廷玉请罢配享，又在朝臣一片停罢、羞辱声中，正式下令取消其配享。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仍获准“优食太庙”。纵观乾隆帝对其配享的反复予夺，以及张廷玉竟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大臣，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对满汉竞争的厌恶与忌惮，以及对汉人官员始终未曾消散的防范与压制。

和琳，满洲正红旗人，权臣和珅亲弟，是清代唯一被撤出太庙的配享功臣。乾隆年间，和琳由李天培案崭露头角，后与福康安在平定廓尔喀、征讨苗民起义中配合默契，屡立功勋。嘉庆元年（1796），和琳病死军中。在太上皇乾隆帝的授意下，嘉庆帝令其配享太庙。时过三年，乾隆帝崩，嘉庆帝即刻发难和珅，宣布其 20 条罪状，和琳也受到牵连——他在李天培案中的告发被视作“倾陷之计”，而备受先帝认可的军功也遭到否定。嘉庆帝甚至直言：“配享太庙，尤为非常钜典。和琳何人，乃与开国功臣同列？”（《清仁宗实录》）和琳遂被撤出太庙。清代权力斗争对官员身后荣誉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功臣配享太庙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特质，始终难以逃脱政治权力

的桎梏。赏赐或褫夺官员配享，只能由皇帝一人作出决断，而清代皇权也借此得到极大彰显。

## 成为清廷对功臣的最高褒奖

太庙作为承载王朝先祖神灵的祭祀场所，在皇族家庙的本初含义外，又衍生出国之象征的深刻内涵。基于此，历代帝王将功臣神位于太庙，也渐趋成为王公、大臣逝后的至上荣典。功臣配享太庙由此被渲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代表帝王对有功之臣的认可、褒奖与追思，也相应成为笼络、激励臣子的重要手段，更含有维护封建统治与皇权政治的深远寄托。

对此，来自关外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有着深刻认知。嘉庆元年乾隆帝所下敕旨：“国家立法，诸臣中有勤于王事、功绩最著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庸。其公忠体国、超众宣劳之王大臣，并有配享之例”（《嘉庆朝上谕档》），将清帝对功臣配享在人员、功劳、用途等方面的规定性表露无遗。在晚清风雨飘摇中，僧格林沁与奕訢的先后配享，也是清帝对臣工“所以示崇报之典，为万世臣树之鹄也”（《清德宗实录》）的有力彰显。

当然，清代功臣配享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与皇权政治。太庙前殿所列先祖与东西庑所列功臣（王、大臣）神位，以及配享功臣神位的依次排列，这种正享与配享、东庑与西庑的差别化对待，正是对以“别尊卑”为内核的封建礼制的历史映射。同时，清代功臣配享亦是对统治集团政策的有力彰显与维护。

在 26 名配享人员中，旗人占比近乎九成，这显然是缘于大清自开国以来便奉行不悖的策——“推崇满洲”，即在各个方面确保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策凌、僧格林沁作为蒙古亲王“同僚馨香”，尤其是策凌还被特擢至宗室王公才可配享之东庑，除却二人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功绩，显然还有清帝拉拢蒙古亲贵的政治深意。清朝仅有张廷玉一位汉臣荣膺配享，再结合其配享阻力之大，我们不难看出：清帝提及的“满汉一家”言辞，始终都抵不过统治阶层对汉人官员天然的、长期的防范与压制。

综上可知，清代功臣配享太庙的政治作用是显著而巨大的。它在清代皇权的约束与保护下，很好地扮演了王朝所赋予的“报功”与“劝忠”的重要角色，成为官方对有功之臣的最高褒奖。与此同时，它又受当朝政策的强烈影响，以鲜明特色巩固了清代统治与皇权政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化进程的困境所在。

## 庄寨深刻改变地方社会

庄寨主要分布在福建省永泰县，是一种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的大型建筑，它与周边地区的土堡、土楼等建筑在形制上颇有关联。围绕着庄寨建设与宗族发展的关系，几位学人均为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蔡宣皓对清代咸丰年间的两份阁书中的建筑术语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董思思  
促进跨学科对话与交流

此次工作坊的举办，肇始于不同学科研究者对闽中戴云山区的共同关注。2016 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在位于戴云山脉的永泰县以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族谱、契约、账簿、日用文书、科仪本等民间文献。与此同时，建筑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亦进入这一地区，对当地的庄寨展开研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在共同的田野工作经历中，逐渐意识到彼此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郑振满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在戴云山区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中，需要对田野工作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不应仅将田野工作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且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田野工作的意义进行理解和把握。在田野工作中，无论是识读文献，还是分析建筑形制，都应当从乡村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理解其生存策略，并经由研究者个人的体验加以切实的体认。

跨学科研究的前提，还需要建构一些共同的议题，以便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此，与会的人类学学者尝试从理论层面讨论对空间的理解和使用。与建筑学和建筑史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的研究方法不同，人类学意识到了空间作为实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进而讨论其对身体和社会的建构和改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耕对庄寨内部空间的研究，反思了过往研究中将空间消解于社群等级、宇宙观、文化分类等其他要素当中，将对空间的研究化约为社会文化本身的研究倾向，提出应当从空间本身的物质性出发，关注其差别以及对人们身体、记忆和社会的改变。在庄寨的个案中，她分别从规矩、示能、氛围三个方面讨论了庄寨的空间布局如何塑造了人们的身体惯习、性别分工以及对事件的记忆。

## 将建筑置于历史脉络中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建筑形制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系谱学或技术史层面，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历史进程。考察建筑形制和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周易知梳理了戴云山脉乃至东南地区的“厅”和“堂”在语言与建筑空间的分布情况，认为“厅”和“堂”应当是当时起源，用于表达中原地区上流社会不同的建筑功能，并在不同时期被周边区域所采用，又随着移民与文化交流不断互相影响和演化，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分布结果。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青年会刘妍在对闽北浙南山区木拱桥的营造技艺进行修复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出现的原因。这种营造技艺或许与明代以来东南银矿的大规模开发有关。

如何实现建筑学研究的地方性转向和历史转向，从方法论而言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借助民间文献。与官方典籍相比，民间文献能够更为丰富和细致地呈现地方社会的面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李竟扬通过对山西高平游仙寺中碑刻的解读并结合历代典籍，讨论了游仙寺从北宋时期十方丛林到金元时期地方豪强李氏家族功德寺的历史转变，这是一个案为研究金元时期华北地区宗族建设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在解读碑刻时，兼顾了对碑刻石质、造型、字体的分析，并结合了寺庙建筑的时代特征，这一思路为历史学研究中研读民间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样是与经济作物相关的议题，建筑学研究则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颇为不同的取向。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黄华青对武夷山的茶叶家庭作坊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空间实体的变化本身如何作用于文化并形塑社会。虽然武夷山区的制茶技术强于阿萨姆地区，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前者却无法成功转型为机械化工厂，最终导致衰落。两地茶业技术工业化背后的差异性，正是中国近代乡村工业

# 晋商开启中俄“茶叶之路”

◎刘肃勇

中国自古输往西方的商品，最早的大宗贸易品是以丝绸为主，遂有中西“丝绸之路”的美名。其后，7世纪前半期的唐王朝，中国向西方贩易的商品，增添了次于丝绸的两大新品种——瓷器与茶叶，从而兴起了中西“瓷器之路”或中西“茶叶之路”。

中国茶叶是从 14 世纪至 17 世纪，由陆路经中亚、印度北部传到阿拉伯半岛，再传到欧洲。欧洲人先以水煎制茶叶成热茶饮服，用来“祛身热”“解腰痛”或“解关节痛”。其后，欧洲开始盛行饮茶。欧洲茶商便购置中国茶叶，从海上航运到欧洲大陆销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虽然贩运到欧洲的茶叶以海运为主，但俄罗斯人初始饮用的茶叶，却是从中国经陆路直接运抵俄国的。

1675 年，俄国使臣尼果赖来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帝赐给尼果赖 4 匹茶叶，并请俄使代为转赠沙皇 8 匹茶叶，品尝饮用，这可能是俄罗斯上层人士最早饮用中国茶叶的记载。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则是从 17 世纪后半期开始兴盛的，将中国茶叶贩运到俄国的绝大部分是山西富商，俗称为晋商。

晋商自南北朝时便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发展壮大，明清时期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晋商主要从事

的贸易是皮货生意，即从西域各游牧狩猎民族中，收购山羊皮、绵羊皮及各类兽皮，运往中原区售卖。除皮货贸易之外，晋商还经营茶叶贸易，将南方的茶叶向北方边疆贩运。甚至在福建武夷山区购地种植茶树，进而运销至山西、蒙古等地乃至中俄边境中国一方的尼布楚。

1689 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后，俄国与清王朝外交关系大为缓和，中俄边关贸易渐趋活跃。晋商则乘时组建茶叶商队，将福建武夷山茶叶运到武昌过长江，经洛阳、泽州（晋城）、忻州而至张家口，转往库伦（乌兰巴托）进入俄国境内，转卖给俄商，销售给俄罗斯人饮用，这即是晋商早期开启的中俄“茶叶之路”。尼布楚则是中国茶叶最初运抵俄国的集散地以及销往俄国各地的重要地点之一。

晋商同俄国商人进行茶叶交易时，有利条件是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境内的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历经几个世纪的皮货商业交易，使用两国各自语言讨价还价争论时，形成几种腔调的“协合语”，即形成了行之可共通的特类语言：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蒙古腔的俄语或汉语。

晋商历经中俄陆路运抵俄国的中国茶叶，尤能够完整保留中国茶叶原

汁美味，有别于从中国广州出口到欧洲，历经海上航运而潮湿变味的茶叶，因而备受俄罗斯上层人士的欢迎，出重金购买来饮用。

1728 年，清朝雍正皇帝同俄国签定《恰克图条约》，约定中俄以恰克图为界。恰克图原本是中俄边境上的一个商埠小镇。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恰克图的旧市街归属俄国，清王朝则在紧靠恰克图中国境内的一侧，另建一座恰克图新街，俗称买卖城。此后，买卖城成为中国向俄国大量出口茶叶的集散地，恰克图旧市街则是中俄两国茶叶贸易的新枢纽。专业贩运茶叶的大晋商，争先恐后地涌入买卖城，开展中俄茶叶贸易，茶叶市场极为繁荣，清乾隆时期达到最高峰。据俄罗斯学者统计，1755—1762 年，中国向俄国恰克图输入茶叶年平均量为 11000—13000 普特（1 普特为 16.38 公斤），至 1768—1785 年间，年平均输入量上升至 29000 普特，俄罗斯人几乎全民性饮用中国茶，成平日生活中离不开的习惯。

中国茶叶从陆上输入俄国，归功于晋商的开启。晋商开启的中俄“茶叶之路”，起源于中俄之间古已有之的贸易路径，兴旺于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中俄交流史上重要一页。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